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42 期
2026 年 4 月．頁 123-150
國立臺灣文學館

從邊緣回歸正典*

——1990 年代楊千鶴日語文藝的跨語境傳播與女性主體翻譯實踐

陳瑞益
國立臺灣圖書館研究助理

摘要

本研究旨在考察 1990 年代楊千鶴日語文藝的跨語境傳播，並將其置於海外台灣人社群與島內本土化運動交織的歷史脈絡中進行審視。過去台灣翻譯史多聚焦於男性作家或國族敘事的縱向繼承，本研究則透過楊千鶴個案，填補戰後日治女性文藝在翻譯系譜中的缺席狀態。

研究發現，楊千鶴的戰後復出，不僅受到地緣政治的牽動，也深受海外台灣人社群的文化動能影響，其再現路徑實為一種「由外而內」的逆向現身。在文本分析方面，本文透過比對戰前與戰後〈花開時節〉的日文底本，揭示楊千鶴採取「策略性篡奪」與「介入式重寫」的方式，在文本內部植入微觀的時間刻度與制度焦慮，從而深化女性主體意識。此外，由楊千鶴與其女林智美進行的母女合譯實踐，搭配「厚實翻譯」的副文本編纂策略，成功翻轉了早期由男性主導的譯介框架，奪回跨語境傳播的話語權，並確立其版本在文學史中的正典地位。最終，本文提出植根於台灣在地的「女性主體翻譯實踐」，為台灣翻譯史與性別研究提供具備批判潛能的論述維度。

關鍵詞：楊千鶴、海外台灣人社群、跨語境傳播、介入式重寫、厚實翻譯、女性主體翻譯實踐

＊ 本文初稿曾於「2025 年台灣文學學會年會」宣讀，承蒙與會學者提供諸多精闢建議。此外，本稿於期刊審查期間，亦獲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修改意見，使本研究益臻完善，特此致忱。

From the Periphery to the Canon:

The Translingual Dissemination and Female Subjectivity Translation Practice of Yang Chian-ho's Japanese Literature in the 1990s

Chen Jui-Yi

Research Assistant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translingual dissemination of Yang Chian-ho's Japanese-language corpora during the 1990s, situating it within the historical interplay between overseas Taiwanese communities and Taiwan's localization movement. Departing from traditional Taiwanese translation historiography—which often emphasizes male-centric lineages or national narratives—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Yang's case to address the absence of female literary voices from the colonial era in post-war translation genealogies.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Yang's post-war reemergence was not only shaped by geopolitical shifts but also by the cultural agency of overseas Taiwanese communities, producing a distinctive "outside-in" trajectory of rediscovery.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pre-war and post-war Japanese versions of *The Season When Flowers Bloom*,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how Yang's deployment of "strategic usurpation" and "interventional rewriting"—specifically through the embedding of subtle temporal scales and institutional anxieties—effectively asserts a nuanced female subjectivity. Furthermore, the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 by Yang and her daughter, Lin Chih-mei, complemented by a "thick translation" paratextual strategy, successfully disrupts entrenched male-dominated frameworks of 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 within the Taiwanese literary field. In reclaiming control over her translingual afterlife, Yang not only reconfigures her literary legacy but also

consolidates her canonical status.

Ultimately, this study proposes a model of “female subjectivity translation practice” rooted in the Taiwanese context, offering a critical intervention for both Taiwa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gender studies.

Keywords: Yang Chian-ho, Overseas Taiwanese Communities, Translingual Dissemination, Interventional Rewriting, Thick Translation, Female Subjectivity Translation Practice

一、前言

日治時期台灣日語及跨語作家，在經歷日本帝國與國民政府的政權更迭後，其文藝資產從失語沉寂、記憶重現再到文本翻譯，構築了戰後島內重層的日譯文學脈絡。

此一跨時代的記憶重現，濫觴始於 1950 年代，由黃得時、廖漢臣與吳濁流等人，透過台北市文獻委員會出版的《臺北文物》，在〈北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專號〉中，率先論說了部分日治時期的新文學活動。[1]

然而，此舉雖是戰後初期「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文化重建餘波後，[2] 對重訪日治時期文藝所做的努力：試圖披上官方認可的中國化外衣，再現日治時期文學及歷史運動。但終究無力撼動國民黨政權戮力建構的三民主義文藝、反共文藝與中華文化中心的純正文藝系統，[3] 因而位處文藝場域的邊緣地帶。

直到 1970 年代，國民黨政權面臨一連串外交挫敗，以及海外獨立運動拋出的統治正當性問題，[4]「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在反西化和嫁接中國抵抗強權外侮的敘述模式下，其反殖文本與時代精神被重新發掘與論述。[5] 島內外知識分子，無論省籍，尤其推崇反映中國民族精神的鍾理和及抗日英雄作家楊逵，[6] 他們的文本，再三透過上述框架加以敘說和譯介。

---

1 關於新文學運動影響論之座談，參見黃得時，〈臺灣新文學運動概觀（上）——一、導言（「新青年」時代）・二、新文學運動的先聲（「臺灣雜誌」時代）・三、新文學運動的發軔（「臺灣民報」時代）〉；廖漢臣，〈新舊文學之爭（上）——臺灣文壇一筆流水賬〉；吳濁流，〈新文學運動的雰圍氣〉，《臺北文物》「北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專號」3 卷 2 期（1954.08），頁 13-25；頁 26-37；頁 48-49。

2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麥田出版社，2017.08），頁 17、141-143。黃英哲以此術語指涉國府將「日本化」的台灣人重新「國民化」之歷程，強調在「去日本化」的同時，將台灣整合進以中國為中心的文化體制。本文採納此術語，旨在凸顯戰後初期具備「政治重編」意涵的文化重建工程。

3 三民主義文藝及反共文藝中健康寫實主義系統的建構，參見張俐璇，《建構與流變：「寫實主義」與臺灣小說生產》（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6.02），頁 188-213；國民黨以大中華文化中心建構純正文藝系統的脈絡，參見張誦聖，《臺灣文學生態：戒嚴法到市場律》（台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2.12），頁 109-126。

4 何義麟、許維德、藍適齊主編，〈第二章　統治正當性危機下的論辯（1972-1974）〉，《思鄉懷國：海外臺灣人運動文獻選輯》（台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22.12），頁 123-190。

5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8.06），頁 155-180。

6 同註 5，頁 181-190。

時至 1980 年代黨外運動激化，促使日治文藝重新建構，催生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文學，到 1990 年代，進一步發展出族群融合的台灣民族建國文學。[7] 舉凡 1970 年代末陳少廷的《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1987 年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和 1991 年彭瑞金的《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等著作，於漸進本土化和台灣化的時空下，日治時期男性文藝得到經典化，也同時進行這批譯本的跨語境傳播。但日語作家在戰後台灣文學場的重訪，毋寧顯露出男性中心的譯介觀，致使女性作家的文藝資產受到忽視，納入性別視角的跨語境翻譯實踐，也相對暫居邊緣地帶。

因此，本文藉由楊千鶴文論的翻譯研究，旨在增添戰後日治時期女性文藝的翻譯系譜，並由此檢視與回應當前的台灣翻譯研究，以及楊千鶴翻譯研究兩個面向。

關於前者，台灣翻譯研究的通論性著作，可參閱賴慈芸主編的《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該書宏觀地涵蓋日治到戒嚴時期的台灣翻譯研究與歷史脈絡。雖然未出現日治時期女作家的跨語翻譯專論，但賴慈芸論及翻譯研究的轉向之處，卻是重要的參考點。箇中指出原文與譯文的對等關係不再重要，而是側重翻譯的時代性、規範、出現與不出現、譯者、中介者與贊助機構及地緣政治等問題。[8] 王惠珍的《譯者再現：台灣作家在東亞跨語越境的翻譯實踐》，則重估戰前 1930 年代，至戰後 1990 年代台灣日語作家，以日語構成的翻譯連結。但書中多以男性作家及譯者為案例，形成男性為主的譯者再現，不過書中論及 1970 年代鍾肇政和 1980 年代葉石濤的翻譯情境，提供讀者鳥瞰日治時期文學的整理、回歸和政治考量。[9] 而鄧敏君則有專文研究《亞細亞的孤兒》之翻譯，[10] 文內雖提及台灣知名女譯者黃玉燕的譯介業績，但探討主軸在於《亞細亞的孤兒》該作，其不同譯本的生成環境，並論述譯本的後續影響。在此，女性譯者及其譯業並非關懷重點，更多的是吳濁流該篇小說的譯介研究。

---

7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12），頁 157-227。

8 賴慈芸，〈導論〉，賴慈芸主編，《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09），頁 10-13。

9 王惠珍，《譯者再現：台灣作家在東亞跨語越境的翻譯實踐》（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20.10）。參照專書第五章及第六章。

10 鄧敏君，〈《亞細亞的孤兒》：翻譯、重譯與翻譯文本外部的聲音〉，《翻譯學研究集刊》22 輯（2018.12），頁 83-100。

綜觀台灣翻譯研究的既有著述，有助於釐清當前台灣翻譯史的參照面向與發展脈絡。然而，從中卻可觀察到，一項承襲自戰後「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回歸的經典化偏向：即亦步亦趨沿襲男性文藝的經典體系，不僅闕漏台灣日語女作家和女性翻譯家的身影，更遑論楊千鶴戰後回歸台灣本土文壇的研究。在此學術背景下，針對楊千鶴的翻譯研究，其現狀與進展又如何呢？

陳怡君透過楊千鶴生命史的爬梳，指出楊千鶴雖於 1970 年代赴美定居，但在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後，於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出土的情境下，由島內外的文化人串聯，漸漸在台灣本土文藝場域現身。[11] 但其論文未梳理楊千鶴彼時所處的海外台灣人政治社群及文藝場域概況，也未釐清島內外翻譯實踐時，箇中發生的摩擦與齟齬。Aoife Cantrill 則針對 1979 年、1992 年及 2001 年楊千鶴〈花開時節〉的中譯本，分析譯文、譯者與時代脈絡，從中點出翻譯實踐的殊異生成和意圖。[12] 然而，Cantrill 的分析主軸並非楊千鶴再復出的時代性，以及島內外跨域的文化翻譯，譯文之外的背景論述自然聊備一格。更關鍵的問題在於，Cantrill 未能察覺楊千鶴身兼作者與譯者，對自身日語文本進行重寫與改寫，進一步影響 2001 年的中譯本。

換言之，即使是楊千鶴的翻譯研究，其人復出的時代性幾乎未曾爬梳，翻譯文本時的性別意識和主張也鮮少覺察，導致 1990 年代楊千鶴的發聲位置，及其日語文藝的翻譯實踐尚待釐清。

基於上述討論，本文旨在脈絡化地考察楊千鶴的復出及文本翻譯活動，試圖將其再登場置於 1980 至 90 年代海外台灣人社群與島內本土化運動的交會點。在此架構下，「跨語境傳播」側重於楊千鶴再現的空間路徑與媒介機制；「女性主體翻譯實踐」則聚焦於文本內部的介入策略。兩者互為表裡：前者為其提供發聲的物質基礎與傳播網絡，後者則構築了回歸正典時，不可或缺的女性主體詮釋座標。

---

11 陳怡君，〈日治時期女性自我主體的實踐——論楊千鶴及其作品〉（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 107-115。

12 Aoife Cantrill, “Mother of the Nation: A Short Translation History of Yang Qianhe’s ‘Flower Blooming Seas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vol. 6, no. 1, 2023, pp. 82-108.

進一步來看，這種座標來自於作者身兼譯者的「重寫」身分，透過對文本細節的刻意疊加與詮釋權收攏，展現回應早期男性中心譯介觀的性別能動性。為落實此論證路徑，筆者首先探討楊千鶴所處的海外台灣人社群，將其置於地緣政治環境中，分析現身過程與歷史處境。其次，著重於楊千鶴與島內外文藝社群的連結互動。最後，細讀其文藝的跨語境傳播，以此提出台灣版的「女性主體翻譯實踐」，並與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對話，進而回應台灣翻譯史中，闕漏台灣日語女作家與翻譯家的身影，以及楊千鶴翻譯研究不足的學術問題。

二、海外台灣人社群與楊千鶴的交會

根據中譯版《人生的三稜鏡》中，林智美編纂的楊千鶴年譜記載，楊千鶴因長女智美獲得留美獎學金，並為其生孕前往美國，最終於 1977 年 7 月赴美定居。[13] 由此觀之，楊千鶴的戰後復出，實與此一跨太平洋的身分移轉緊密相關。然而，此一移動並非孤立的家庭事件，而是與「海外台灣人社群」，在政治高壓下的空間開拓產生共振。本文將論述聚焦於互動最頻繁的美、日兩地，其跨國網絡實由雙軸協作而成：一端是林衡哲、吳西面等人為核心的「台美人社群」，在 1980 年代島內政治轉型與海外文化自覺的交點上，集結同鄉資源，構築出版與媒介的論述空間；另一端則是張良澤深耕日本的史料發掘，憑藉對殖民遺緒的跨代掌握，為該空間注入關鍵的歷史素材。

這兩股力量的對接，共同造就楊千鶴從個人沉默轉向集體發聲的生產機制。若要釐清此一合流，必先考察戰後台灣政治處境，如何擠壓出這群流徙海外的文藝社群，以及政治光譜如何與楊千鶴產生共振。

戰後台灣歷經了日本帝國向中華民國的政權移轉，並在冷戰反共體系下構築日台關係；與此同時，國府政權亦急遽「去日本化」和「再中國化」。[14] 儘管彼時國府政權的接收與建立並不樂觀，台灣曾一度顯露本土自治的可能性；然而，隨著韓戰爆發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參戰，情勢隨之逆轉。美國為防韓國與台灣所在

13 楊千鶴著，張良澤、林智美譯，《人生的三稜鏡》（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03）。

14 川島真，〈日華‧日台二重関係の形成——一九四五—四九年——〉，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著，《日台関係史 1945-2008》（日本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03），頁 31-36。

的島鏈遭受赤化，遂與國府政權展開協商，最終共同建構國府在台的威權統治。在 1950 年代，儘管國府並非美國遠東政策下象徵自由民主的理想夥伴，但為遏止共產政權擴張，美國選擇默許其對台控制。自此，於美援體系下，中華民國在台的威權體制正式形成。[15]

在該體制下，諸多台籍菁英因不滿隨之而來的政治清算、經濟惡化及文藝場域更迭，遂溢出體制，遠赴日本與美國等海外地區，在他方開啟台灣政治運動與本土文藝的復興之路。這種由政治高壓與冷戰體制共同擠壓出的「海外空間」，實質上成為台灣本土文藝的異質保留區。當島內因肅殺的政治氛圍而面臨文化收編與記憶斷裂時，溢出體制的台籍菁英遂在異國建起獨自的文藝生產體系。與楊千鶴戰後再現路徑相關的幾位關鍵人物——林衡哲、吳西面與張良澤，便是在此一歷史脈絡下，分別透過出版、媒介與史料發掘，建構出足以承接戰前歷史記憶的文化機制。

在此「異國生產體系」的實踐中，林衡哲的角色尤為關鍵。林氏的主業雖是醫師，卻在台大醫學院時期便參與「新潮文庫」的催生，展現知識啟蒙的熱忱；1968 年赴美後，透過同鄉會講座、彭明敏演講及台灣文獻的洗禮，進一步將此熱忱轉化為自覺的台獨政治與本土文化意識。[16] 1982 年，林氏以在南加州相遇楊逵與張良澤為契機，正式啟動深耕台灣文化的「台灣文庫」出版計畫，包括楊千鶴《人生的三稜鏡》在內的多部傳記文集皆誕生於此。[17] 再者，林氏與當時海外台裔人士，於同年創立台灣文學研究會，共同籌辦年會論文宣讀會、台灣本地作家座談會、出版事業等。[18] 彼時美國台灣文學研究會的成立，與中共和國民黨政權收編港台文學史相關，而島內台灣文學研究，又掣肘於 1977-78 年鄉土文學論戰後肅殺的政治氛圍，[19] 因此，海外台灣人社群建置的研究組織，實為台籍菁英

15 陳翠蓮，《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美國、國民黨政府與臺灣社會的三方角力》（台北：春山出版，2023.11），頁 138-147。

16 林衡哲，《林衡哲 80 回憶集》（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2020.02），頁 93-95。

17 同註 16，頁 96-99。

18 台灣文學研究會主編，《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08），頁 315-324。

19 張俐璇，〈北美臺灣文學研究的發展：以「台灣文學研究會」與《台灣文學英譯叢刊》為例〉，《台灣文學研究彙刊》23 期（2020.02），頁 79-80。

在政治狹縫中重奪文化主體性的關鍵實踐。此一海外構築的論述空間，預先為戰前作家留下發聲的文化位置與編輯資源，使其在海外得以從沉默中被引渡出來。正是這份集體傳承的期待，促使楊千鶴能夠將個人記憶轉化為具備史料意義的文字著作。

除組織建置外，印刷媒介作為民族與國族的想像共同體，跨域連結的效力不可或缺。[20] 1986 年，台美人吳西面成立南加州台灣人聯合基金會，自海外支援台灣民主運動；隨後在與林衡哲共同籌劃「台灣文化之夜」的契機下，進一步促成海外台美人報紙——《太平洋時報》。[21] 該報以政治、經濟、國防與文化思想為內容，建構出跨域的綜合性論述空間，並在刊載島內外藝文資訊、傳遞台灣研究與串聯海外台灣人社群活動中，扮演重要的媒介橋樑。[22] 在林衡哲編輯「台灣文化專刊：白鷺鷥」之後，《太平洋時報》再闢軟性台灣藝文版面，使其有別於刊載中國文化的報刊。[23] 此媒介空間的開闢，使《太平洋時報》不僅是資訊傳遞的渠道，更成為楊千鶴等人重啟現實連結的關鍵機制。由林衡哲與吳西面構築的這套體系，實則為斷裂的歷史記憶預留待填補的主體空間，使楊千鶴得以在長期沉默後，獲得重新介入台灣文壇的契機。

事實上，從林衡哲、吳西面到林智美的赴美案例可見，在美國介入遠東及國府的冷戰局勢下，美國扮演著有別於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體角色。這使得流徙至美國的台籍菁英，得以從事台灣獨立運動，並發表受國府壓抑的言論及文藝作品。此一現象在林衡哲的生命歷程尤為明顯，他曾自述，早期在大學時代深受《文星》雜誌自由主義的啟發，甚至連帶翻譯了《羅素回憶集》和《羅素傳》。[24] 一

20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2006, pp. 37-46.；蘇碩斌，〈活字印刷與臺灣意識：日治時期臺灣民族主義想像的社會機制〉，洪淑芩，《聚焦臺灣：作家、媒介與文學史的連結》（台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06），頁 78-82。

21 林衡哲，《開創台灣文化的新時代》（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11），頁 240；陳惠亭，〈太平洋時報的初期奮鬥史 (1989)〉（來源：https://taiwaneseamericanhistory.org/blog/my-stories-693/，檢索日期：2025.09.14）。

22 據台美史料中心記載，《太平洋時報》（*Pacific Times*）實於 1987 年 7 月 4 日創刊發行第一期；惟受限於目前數位典藏狀況，本文係參閱南加州大學圖書館（USC Library）所藏之同年 12 月號影像。

23 林衡哲，《開創台灣文化的新時代》，頁 187-190。

24 林衡哲，《林衡哲 80 回憶集》，頁 74-78。

方面，這是《文星》雜誌在威權反共時期，策略性地迴避敏感政治禁忌後，轉而傳播五四運動中自由主義思潮的結果。[25] 另一方面，林衡哲在島內同時受美國遠東冷戰系統下西化思潮的影響，[26] 由此萌生對自由主義的強烈傾慕。因此，此一歷程可視為台籍知識菁英，在日中美冷戰體制下的台灣島內，披覆國民黨化的知識外衣，隨後在西化思潮影響下，流徙美國，並轉而脫下外衣，建構台灣獨立和本土文化的新論述。

但此流徙脈絡存在顯著的世代斷層：林衡哲代表受冷戰時代啟蒙、在海外「主動尋根」的青年菁英；楊千鶴則是帶有日治記憶、依親「被動流徙」的戰前作家。這種「尋根者」與「見證者」的動機差異，使林氏經營的文庫與媒介機制，實質上成為一個預留的主體空間，只待楊千鶴等人這類斷裂的歷史記憶進場填補。

在日本方面，因二次大戰戰敗後亟欲復甦經濟，致使對台的去殖民化工程未能徹底。此一歷史遺緒，不僅根植於台日兩地，更形成跨地域、跨時代的「日本語世代」；與此同時，隨著中華民國政權撤退來台，日台在正式斷交前發展出特殊的國與國外交模式：即經濟往來先行，政治認同居後。

在此模式下，日華關係正常化時期，中華民國代行政治外交，並於 1952 年成立中日文化經濟協會。該協會具體形塑了一個以通商、文化交流與留學生派遣為核心的特殊國際網絡。[27] 然而，此一網絡直到 1972 至 78 年間，在著名的「七二體制」形成後，其性質發生結構性轉變：在政治外交層面，排除中華民國的官方地位；在文化經濟層面，確立了半公半私、實質性的日台交流格局。[28]

由此可見，即便中華民國在台灣戮力推行再中國化，甚至在知識體系上國民黨化，但肇因於日台特殊的國際政治環境，日本帝國的殖民遺緒依舊影響島內。

---

25 李亞橋，〈「內戰—冷戰」結構下《文星》雜誌的自由主義文化運動〉（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24），頁 158-161。

26 王梅香，〈隱蔽權力：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文學（1950-1962）〉（新竹：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5），頁 97-111；張俐璇，〈冷戰年代的翻譯介入——「新潮文庫」的譯者觀察（1967-1980）〉，《文史台灣學報》3 期（2011.12），頁 53-98。

27 川島真，〈日華関係正常化の進行——一九五〇—五七年——〉，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著，《日台関係史 1945-2008》，頁 50-54。

28 清水麗，〈日華断交と七十二年体制の形成——一九七二—七八年——〉，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著，《日台関係史 1945-2008》，頁 110-123。

事實上，張良澤其人不僅在美中冷戰體制下，接受國民黨的文藝傳播及冷戰系統的西化知識，更因其叔叔（二戰期間「志願」為日從軍，後定居日本）的影響，在大學期間勤學日文準備赴日深造，同時與島內本省作家交流往來。[29]

張良澤負笈東瀛求學後，不僅習得非國民黨版本的中國文學，更在世界弱小文學體系下，初次發現殖民地台灣文學。透過與增田先生的交流，接觸到尾崎秀樹「文學的傷痕」一書，從而發掘赴日前未能知曉的戰前台灣文學系譜。[30]

換言之，張良澤的經歷，可視為在日本帝國殖民遺緒，與日台特殊國際關係的交織下，因緣際會促發的台灣研究啟蒙歷程。這趟留日經驗，奠基了他的台灣文學研究資本，促成日後與美麗島政治犯許榮淑、周清玉、流離美國的黨外人士許信良、流亡海外的史明，共同受邀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營演講。[31] 正是這種跨國移動的背景，讓 1982 年於德拉瓦大學（University of Delaware）舉行的夏令會，不單是政治集結，更實質促成了海外文藝生產機制的合流。

當張良澤在攤位販售《台灣文藝》時，與楊千鶴母女的意外交會、鼓勵提筆，[32] 不應僅視為偶然重逢，而是張氏的史料資本與海外社群的論述空間，在此刻精準對接，為楊千鶴的記憶找到了出口。相對於林衡哲等人「主動尋根」的青年背景，因依親而「被動流徙」的楊千鶴，其長期噤聲的日語記憶，在張良澤的發掘、媒體的傳播與出版計畫的接力下，得以從個人沉默轉化為集體發聲。

此一復出契機，深層奠基於楊千鶴對海外社群的雙重共鳴。政治上，其夫林嘉雄受國府羅織冤獄的經驗，使她遠離威權體制；文化上，海外社群重建日治文藝系譜的努力，正契合戰前作家的身分。這種「政治創傷」與「文化歸屬」的交

---

29 張良澤，《四十五自述：我的文學歷程》（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02），頁 92-105。

30 同註 29，頁 168-186；張氏在回憶中詳述留日期間受教於增田涉，並獲增田氏親自出示一本封面印有「世界弱小民族文學選」之古書；考其版本，應係胡風主編、1936 年 5 月由上海生活書店發行之《弱小民族小說選》（列為「世界知識叢書」），該選集收錄楊逵〈送報伕〉與呂赫若〈牛車〉等作，為中國知識界正式引介台灣殖民地文學之重要文獻。除此之外，張氏亦於書中提及受尾崎秀樹《文學的傷痕》一書影響，此處實應係指尾崎秀樹的《近代文学の傷痕：大東亜文学者大会・その他》（日本東京：普通社，1963），該作為戰後日本學界重估殖民地文學、發掘戰前台灣文學系譜之關鍵。

31 劉格正，〈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簡史 [二十年是如何走過來的]〉（來源：https://taiwaneseamericanhistory.org/blog/ourjourneys245/，檢索日期：2025.09.15）。

32 同註 29，頁 393-394。

會，使德拉瓦之遇成為關鍵節點，並促成 1989 年日本筑波大學舉行的台灣文學國際會議。透過美、日、台三方社群的接力，楊千鶴的身分正式從記憶見證轉化為台灣文學史重構過程的重要坐標，完成戰前記憶的跨國整合。

三、楊千鶴與島內外文藝的連結

戰後初期，台灣在「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的體制轉換下，使日治時期奠基的文化資本遭移入文化吞噬。[33] 對曾活躍於文藝場域的楊千鶴而言，這不僅是文化語境的斷裂，更伴隨丈夫在極權統治下遭迫害的家庭創傷。[34] 在政經環境動盪與威權體制的雙重夾擊下，楊千鶴被迫退出創作場域。隨後，在 1950 至 1970 年代美援體制的留學浪潮中，[35] 楊千鶴於 1977 年隨長女赴美定居，在台灣文壇銷聲匿跡。這種從「語言中斷」到「空間位移」的雙重邊緣化，雖使楊千鶴被本島文壇忘卻，卻也意外為其在 1980 年代海外台灣人社群中，預留一個具備「戰前記憶」與「跨國視野」的特殊位置。

在楊千鶴遠赴美國之際，台灣文學場域正於 1970 年代轉向「回歸現實、回歸鄉土」，開啟挖掘日治時期作家及作品的時機。[36] 如蕭阿勤指出，1980 年代前後，台灣歷經外交挫敗與黨外運動激化，促使日治文藝資產被賦予文化民族主義的重新詮釋，並於 1990 年代進一步發展為融合族群的建國文學。[37] 此一從 1970 到 90 年代的場域變遷，不僅是宏觀的認同重構，更在結構上為楊千鶴的復出預留銜接空間。正因本土化轉向亟需建構歷史正當性，使身處海外、保有戰前日語創作紀錄的楊千鶴，成為重構文學正典時關鍵的銜接座標。此一過程亦如王惠珍所論的翻譯實踐，使楊千鶴得以透過「跨語翻譯」作為介入策略，將個人生命史嵌入台灣文學史的縱向繼承中。

這種「嵌入」並非僅止於理論層次的對接，而是具體展現在楊千鶴對當時男

33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頁 141-143。

34 楊千鶴，《人生のプリズム》（日本東京：そうぶん社，1993.07），頁 284-317。

35 趙綺娜，〈美國政府在台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一九五一至一九七〇）〉，《歐美研究》31 卷 1 期（2001.03），頁 79-127。

36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頁 141-194。

37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頁 157-227。

性知識分子主導文學史敘事的強力修正。事實上，當時的台灣文學史及翻譯史建構，仍缺乏本省籍女性視角而存在盲點。此一邊緣化處境，引發楊千鶴於 1990 年代對葉石濤的言論質疑。在楊千鶴的公開信指出，葉石濤於不同場合的發言，談到日治時期除了葉陶之外，其他如黃寶桃、張碧華、賴雪紅和楊千鶴等女作家，因缺乏名氣而鮮為人知，作品也無人翻譯。[38] 此一指正葉石濤的文字，同時由長女林智美中譯，並刊載於 1997 年春季號的《文學台灣》。[39] 由內文及刊物本身可見如下幾點：其一，楊千鶴得以重返台灣文壇，仰賴跨國媒介網絡的制度性協作，具體體現在林衡哲作為《文學台灣》美加聯絡人的組織功能：透過 1996 年葉石濤〈《台灣文學集》序〉於《文學台灣》和《太平洋時報》的同步刊載機制，建立了海外與島內文壇的實質連結。[40] 此一組織化的傳播路徑，為身處邊緣的楊千鶴提供了發聲的物質基礎，使其得以快速介入台灣文學場域。

其二，楊千鶴主動將經濟資本轉化為介入文學場域的推力。透過其與長女對《文學台灣》的實質贊助，[41] 不僅鞏固了與島內文藝社群的連結，更藉由張良澤、林智美等人的翻譯接力，將具有女性觀點的日文文章轉為中文發表。此舉使她得以指出 1974 年《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與 1992 年《日據時代臺灣小說選》中，〈花開時節〉該作已獲中譯的實證，奪回自身文藝資產的詮釋主權。

其三，楊千鶴撰文批評沈乃慧，指出她對日治時期女作家及其作品中女性意識的解讀存在偏頗。[42] 藉此展開自身的日語文藝論述，強調箇中女性主體意識的重要及獨特性，並進一步指出當時的主流敘事使日治時期女作家處於邊緣地位。

綜而言之，楊千鶴的連結行動具備深層的策略意圖。她並非全然被動等待他者發掘，而是透過跨國媒介、經濟資本與翻譯鏈結，確立介入台灣文壇的姿態，進而為自身的文藝資產進行正當性辯護。這種經由海外社群發動的逆向現身，展

38 楊千鶴，《楊千鶴作品集 3　花開時節》（台北：南天書局，2001.01），頁 195。

39 楊千鶴著，林智美譯，〈給葉石濤先生的一封公開信〉，《文學台灣》22 期（1997.04），頁 302-314。

40 葉石濤，〈《台灣文學集》序〉，《文學台灣》18 期（1996.04），頁 16-17；葉石濤，〈《台灣文學集》序〉，《太平洋時報》，1996.11，6 版。

41 〈衷心的感謝〉，《文學台灣》13 期（1995.01），頁 334；〈衷心的感謝〉，《文學台灣》14 期（1995.04），頁 334；〈衷心的感謝〉，《文學台灣》15 期（1995.07），頁 338。

42 楊千鶴，〈殷切期待更慎重的研究態度〉，《文學台灣》16 期（1995.10），頁 331-334。

現出 1990 年代台灣文學史的重構，並非單一向度的民族主義敘事，而是交織了女性作家對主體意識與翻譯實踐的積極呼籲，使其行動成為構築本土文學史的重要脈絡。

四、楊千鶴日語文藝的跨語境傳播

爬梳楊千鶴自海外台灣人社群串聯島內外文藝界，在 1990 年代台灣民族主義文學浪潮中，擘劃出獨特的女性主體視角。具體而言，其日治時期的文藝資產，歷經跨語境傳播的複雜歷程，最終由楊千鶴及其女智美共同完成中譯定稿，由南天書局出版《楊千鶴作品集 3　花開時節》。這項翻譯實踐的文本集結，不僅試圖建構女性為主的翻譯系譜，更附帶大量的演講稿、論述、書信、讀者回饋以及中日文並置文本，藉此在多重文獻的補充下，確立其文藝資產的本真性與歷史地位。

儘管楊千鶴及其女林智美的翻譯實踐具有指標性意義，但本節訴諸的跨語境傳播視角，並非意在將母女譯本奉為唯一圭臬或單線終點。相反地，筆者欲揭示的是一種複線且跨時代的傳播圖譜，指出在母女翻譯前，楊千鶴的作品早已存在有限度的譯介軌跡。

值得注意的是張良澤對楊千鶴文藝的評價與翻譯。事實上，張良澤是早期鼓勵楊千鶴重啟書寫、肯定其創作價值的關鍵人物，對於提升楊千鶴在日治時期乃至戰後台灣文學史上的重要性與能見度，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這一影響體現於楊千鶴《人生的三稜鏡》的中文譯本。根據張良澤的〈譯後記〉及林智美的〈為母親譯書的感言〉所述，該書的翻譯先由張良澤字斟句酌地從日文原文譯為中文初稿，隨後將中文譯稿交付林智美修訂。在修訂期間，林智美一邊學習日文，楊千鶴一邊學習中文，最終由母女二人合力，將其修訂為雙方認同的中文譯本。[43]

上述翻譯歷程不僅回應了洛麗 • 張伯倫（Lori Chamberlain）在翻譯研究中，試圖翻轉性別權力隱喻的理論關懷，從而突顯出女性譯者的能動性及其譯文

43　楊千鶴著，張良澤、林智美譯，《人生的三稜鏡》，頁 341-349。

價值；[44] 進一步來看，這場實踐亦揭示了台灣翻譯史中一段關鍵的協作網絡。在 1990 年代具備性別意識的文學史重構得以確立之際，男性知識分子的發掘與中介，實為不可或缺的歷史環節。因此，母女合力的翻譯實踐並非孤立生成，而是立基於張良澤、葉石濤等男性知識分子所建構的出版與跨語路徑，進而展開的詮釋接力。這種由男性發掘、女性深化的動態模式，構成了一個比二元對立更為錯雜的轉譯工程，使翻譯行為從單純的語際轉換，昇華為具備歷史連續性的正典重構。

在此之上，本節將接著探究楊千鶴首篇日文小說〈花開時節〉的中譯文本，進行翻譯實踐層面的細讀比較。雖然楊千鶴〈花開時節〉中譯版本的細讀比較已有研究，[45] 但筆者希望將諸種跨語境文本、翻譯本及副文本，含括性別翻譯研究的關懷，進一步展開補充與對話。

最先翻譯〈花開時節〉並介紹楊千鶴的選集，為鍾肇政及葉石濤主編的《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該本選集無論在宗旨及序言上，都以調和於中國抗日史觀的台灣意識出發，強調台灣文學反帝反封建的抵抗精神。[46] 關於楊千鶴的作者簡介，也強調其 1941 年進入臺灣日日新報當記者，任職數月，即因大東亞戰爭發生，日本政府推行皇民化運動，憤然離職等詞彙，[47] 以此概括作家本人的反抗精神，並收編至當時男性建構的抗日及抵抗史觀中。

時序來到 1983 年，楊千鶴在張良澤的激勵下，於 1993 年在海外自行出版了日文傳記《人生のプリズム》，與此同時，島內由施淑主編《日據時代臺灣小說選》，並由鍾肇政中譯〈花開時節〉。此時 90 年代初，施淑不再以中國史觀下的台灣意識進行詮釋，而是以第三世界台灣文化主義的向度闡明選集。其中〈花開時節〉的作者介紹，不脫《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的說明，但時移境遷，小說添以「被日式教育塑造出來的台灣新女性」之言，[48] 增補女性身分的要素。

---

44 Lori Chamberlain, “Gender and the Metaphorics of Translation.” *Signs*, vol. 13, no. 3, 1988, pp. 454-472.

45 Aoife Cantrill, “Mother of the Nation: A Short Translation History of Yang Qianhe’s ‘Flower Blooming Seas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vol. 6, no. 1, pp. 82-108.

46 鍾肇政、葉石濤主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 8　鬮雞》（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79.07），頁 1-34。

47 同註 46，頁 173。

48 施淑編，《日據時代臺灣小說選》（台北：前衛出版社，1992.12），頁 311。

值此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也正是楊千鶴受邀各大學機關演講，從女性視角談論日治時期的文學與歷史。楊千鶴曾自述，報刊上的評論，多半由女兒智美從日文譯成中文發表，而演講稿，則以參雜台語的中文書寫後，再交由女兒智美校正。[49] 因此楊千鶴的戰後回歸，在語言上不僅是日文翻譯為中文，更有著台語中文轉換為華語中文的過程。其次，由楊千鶴繕打的日文文本，她曾自覺戰後與戰前日文的表述殊異，希望盡可能由自己親身校對，還原回戰前日文的形貌，但混用之處卻在所難免，[50] 所以至 90 年代末期，由楊千鶴彙整的日文文本，實際上有著跨語際混語表述的成分。

然而，經由筆者考察楊千鶴戰前與戰後〈花開時節〉日文文本的修訂，發現其修訂目的並不僅限於作者本人所聲稱的日文表述差異。透過日文版本的細緻比較，筆者發現楊千鶴實則採取「介入式」與「重寫」的策略，對原先日文文本進行大幅度改訂，並讓女性主體意識的表述隨改訂過程現身，進而影響女兒智美的中譯文句。

以下，將徵引三個版本的部分內容，進行比較分析，依序為：

（一）1942 年楊氏千鶴發表於《台湾文学》的〈花咲く季節〉（初刊日文版）

……

三月のある日――、音樂の先生が來て

「今日からそろ、卒業式の歌のけいこをしようと思ひますが、女學校でそれゞ一度うたって來たのだから、先づ、皆でうたって見ませう」

……[51]

（二）2001 年楊千鶴修訂成書的〈花咲く季節〉（修訂日文版）

49 楊千鶴，《楊千鶴作品集 3　花開時節》，頁 40。

50 同註 49，頁 625。

51 楊千鶴，〈花咲く季節〉，《台湾文学》2 卷 3 期（1942.07），頁 145；分析楊千鶴〈花開時節〉的引文底線為筆者所加，以下同。

……

三月のはじめのある日――、音楽の時間に先生が

「今日から卒業式の歌のけいこをしますが、女学校でそれぞれ一度うたって来たのだから、先ず、皆でうたって見ませう」

……[52]

（三）林智美據母親修訂版翻譯的〈花開時節〉（中文譯本）

……

三月初的某一天——音樂老師走進教室來，她說：「從今天起，我們該開始練習唱畢業歌了。妳們以前在〔女學校〕畢業時已唱過了，現在大家就先一起唱唱看吧。」

……[53]

從以上對照可見，楊千鶴以女性作者身分主動介入內容細節，透過重寫 1942 年版的部分內文，刻意強化了女學生面臨畢業時的季節感與時間刻度。

儘管這種時間感的修正微乎其微，但若參照楊千鶴自傳中對少女時代的細膩刻劃，[54] 以及她曾在《文學台灣》中，撰文批判沈乃慧對戰時女學生教育體制與心理變遷的疏漏，[55] 便能察覺此處實為女性主體意識的逐步滲透。對楊千鶴而言，日治時期女學生的生命歷程及其時間流轉下的「花開時節」，是形塑其文藝資產不可或缺的核心環節。

職是之故，其女林智美在譯文中精準地帶出「三月的某一天」與「練習畢業歌」等細節，恰恰點出了女學生在畢業之際，心境糾結於體制規範與個人命運交會的關鍵時刻。

---

52 楊千鶴著，〈花咲く季節〉，《楊千鶴作品集 3　花開時節》，頁 5。

53 楊千鶴著，林智美譯，〈花開時節〉，《楊千鶴作品集 3　花開時節》，頁 143-144。

54 楊千鶴，《人生のプリズム》，頁 100-112。

55 楊千鶴，〈殷切期待更慎重的研究態度〉，《文學台灣》16 期，頁 331-334。

母女二人對日治時期女學生「時間體驗」的重寫和再譯，刻劃了葉石濤（1970 年代）與鍾肇政（1990 年代）等男性譯本中，不能且未能觸及的幽微之處。這種實踐不僅標誌著對男性主導譯本的告別，更透過具備女性主體意識的介入式翻譯，逐步推動母女譯本走向文學正典化之途。

此一策略性的介入與重寫，亦可見諸下列的文本對照案例：

……その他に、少し軌道を外しさうな、先生たちが持てあましてゐる朱映さん、翠苑さんと私の三人組がゐた。……[56]

……その他に、少し軌道を外しさうな、ひとすじ縄ではいかないやうな朱映さん、翠苑さんと私の三人組がいた。……[57]

從以上底線的文本改動可見，楊千鶴刻意將原先僅是「令老師頭痛」的三人組，重寫並增添了「老練、複雜且不簡單」的群體特質。若依循未修訂原版進行翻譯，則會依序呈現如葉石濤（1970 年代）與鍾肇政（1990 年代）的譯介樣貌：

……令老師們感到頭痛的「洒脫不羈」型的朱映、翠苑和我。……[58]

……令老師們感到頭痛的「灑脫不羈」型，該稱為三人幫的朱映、翠苑和我。……[59]

相對而言，林智美依據楊千鶴修訂版所完成的譯文則如下所示：

……此外就是洒脫不羈、讓老師應付不了、另眼看待的三人小組——朱映、

56 楊千鶴，〈花咲く季節〉，《台湾文学》2 卷 3 期，頁 147。

57 同註 52，頁 9。

58 楊千鶴著，陳曉南譯，〈花開時節〉，鍾肇政、葉石濤主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 8　閹雞》，頁 178-179。

59 楊千鶴著，鍾肇政譯，〈花開時節〉，施淑編，《日據時代臺灣小說選》，頁 293。

翠苑與我。……[60]

對比於男性譯者，母女接力的跨語境傳播，透過「另眼看待」的翻譯修辭，精準對應了楊千鶴在日文原稿的介入性改寫。此一處理方式成功將這群女學生的形象，從單純的頑皮群體提煉為「老練、複雜且不簡單」的女性主體，使母女翻譯成為一種具干預性的正典重構。

延續前述，筆者再接著比較相異的跨語境傳播。下列為兩組日文文本對照：其一為戰前楊千鶴發表的初版原文，其二則為戰後親自重寫改訂後的日文版本。

……醫學士夫人はそれでもこんな吐息をもらすことがあつたが、けれど、その時はきまつてこんな言葉を添へるのを忘れるかの女ではなかつた。
「でも、あなた達は一人前ではないわよ。」……[61]

……医学士夫人はそれでもこんな吐息をもらすことがあったが、その時はきまってこんな言葉を添へるのを忘れるかの女ではなかった。
「でも、まだ結婚しないあなた達は一人前ではないわよ」……[62]

從上述底線標示的醫師夫人話語來看，楊千鶴在戰後修訂版中特意強化了「尚未結婚」這一狀態。此項增補實則扣合了全篇小說的核心關懷：即「少女共同體」在面臨婚姻制度時必然崩解的憂懼與不安。因此，「結婚與未婚」的界線，遂成為楊千鶴重寫此段時，用以形塑女學生生命轉折的關鍵線索之一。

由此來看，若以日治時期的初刊版為翻譯底本，便會呈現出如葉石濤（1970年代）與鍾肇政（1990年代）譯本所呈現的跨語境傳播樣貌：

……醫生太太終於也吐了一些生活上的苦經，但說完之後又加上一句：

60 楊千鶴著，林智美譯，〈花開時節〉，《楊千鶴作品集3　花開時節》，頁146。
61 同註56，頁153。
62 楊千鶴著，〈花咲く季節〉，《楊千鶴作品集3　花開時節》，頁21。

「不過妳們現在還不能算是大人哩！」。……[63]

……醫生太太有時也會吐一些生活上的苦經，但每次這麼說完之後，必定不忘加上一句：

「不過妳們現在還不能算是大人哩！」。……[64]

若非基於楊千鶴加筆增補後的修訂版，譯者確實難以憑空譯出「尚未結婚」這一關鍵狀態。相較之下，林智美依據該修訂本所完成的譯文，則精準地呈現了此一文本變貌：

……有時這位醫生太太也會嘆口氣，吐露出這樣的真心話。但是那時她也必定不忘記又再加上一句：

「但是，未結婚的妳們，還不能算是成年人哩。」……[65]

透過母親的改訂增補，進而引導女兒在譯文中精準呈現「尚未結婚」這一關鍵狀態。綜觀上述三組改動，其更動規模確實極其微小，從讀者視角而言，無論是對季節感的細微修正，或是對身分特質的增補，皆不足以在日治文學的解釋脈絡中，劇烈翻轉可能形成的既定框架。

然而，若將這些具體的文字調整，置於楊千鶴晚年與女兒合譯的行動中觀察，其意義在於作者對文本詮釋權的實質介入。在 1990 年代以前，楊千鶴此作多經由葉石濤、鍾肇政等人的譯介進入華文視野，這些中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成功銜接斷裂的文學記憶。

然則，楊千鶴晚年選擇親修底本，透過植入「三月初」的臨界時間感、「另眼看待」的身分特質，以及「尚未結婚」的制度焦慮，實質上是在翻譯發生前，先一步將文本處理成更具戰前女性意識的敘述。這種介入行為，本質上即包含著

63 楊千鶴著，陳曉南譯，〈花開時節〉，鍾肇政・葉石濤主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 8　闇雞》，頁 187。

64 楊千鶴著，鍾肇政譯，〈花開時節〉，施淑編，《日據時代臺灣小說選》，頁 293。

65 同註 60，頁 157。

對早期譯介框架的否定與更迭，但這種更迭卻並非全盤否定前行譯者的歷史功績，而是透過「版本置換」，來回收主體詮釋權。

必須承認的是，對一般讀者來說，這些細微的改動非常隱晦。若沒有跨版本、跨語言的仔細比對，幾乎難以察覺其中的操作痕跡。然而，這些介入的意義並不在於讀者能否立即看出，而在於母女合譯本本身，提供了一個不同於早期譯介框架的文本。這樣的文本，讓後續的詮釋者與研究者，能更貼近作者的女性意識論述，並以此作為參照座標。

此一座標的確立，並非僅是理論上的推演，而是實質改變了 2000 年後的學術場域。觀察陳怡君 2007 年對楊千鶴女性生命史的研究、[66] 呂明純 2010 年對其女性文明想像的論述，[67] 乃至邱貴芬在 2001 年所編纂之具範式地位的選集，[68] 均一致捨棄早期缺少微觀增補的男性譯本，轉向採納具備「三月初」、「另眼看待」、「尚未結婚」等細節的南天版作為論證基礎。這種「引用的集體轉向」，證明了楊千鶴的改寫並非微不足道的遣詞用字修飾，而是透過版本置換，成功地讓女性主體意識從「個人修辭」躍升為「學術正典」，進而完成戰後回歸。

這種從「現象」到「正典」的過渡，實有其深層的翻譯操弄邏輯。在許多翻譯實踐中，「重寫」作為一種翻譯操弄策略，是構築文本意義、體現譯者主觀意圖時不可或缺的環節。誠如安德烈．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所言，翻譯本質上是一種重寫行為，調節了作者、譯者與讀者間的傳播關係。由於非專業讀者多半無法直接觸及原作底本，譯本遂成為接收與評判文學的主要媒介，正是透過這種集體接收模式，經由翻譯重寫後的作品，方能操弄性地邁向正典化之途。[69] 除了文本內部的重構外，勒菲弗爾更提到，譯本若進一步搭配導讀、評論或編為選集，將產生更深遠的影響。這種結合詮釋性內容的翻譯重寫，能進一步模塑讀者對於該版本的正典印象，使其在讀者心中取得「正宗文本」的權威地位，進而成為閱讀與論述的首要依歸。[70]

---

66 陳怡君，〈日治時期女性自我主體的實踐——論楊千鶴及其作品〉。

67 呂明純，〈大東亞體制下的女性文明想像〉，《臺灣文學學報》16 期（2010.06），頁 193-219。

68 邱貴芬主編，《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上（台北：女書文化，2001.07）。

69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Routledge, 1992, pp. 1-10.

70 同註 69。

此一觀點，也恰恰呼應了「厚實翻譯」（Thick Translation）理論所強調的副文本（Paratexts）功能。這些環繞於正文周邊的說明、註解、書信及評論，實則發揮了導引讀者認知、設定敘事框架的關鍵作用。[71]

1990 年代末，由楊千鶴與林智美母女接力重寫，並重新編纂的《楊千鶴作品集 3　花開時節》，在編排策略上與 1970 至 90 年代初期的選集，呈現出顯著的範式轉移。早期選集多僅收錄〈花開時節〉的單篇中譯，並輔以寥寥數語的作者簡介；相較之下，1990 年代末的版本採中日文並置的編排邏輯，並納入大量演講稿、論述與讀者回饋。

在此脈絡下，「厚實翻譯」不再僅是多重文獻的堆疊，而是重塑閱讀框架的策略工具。透過這些環繞正文的副文本，楊千鶴有計畫地修改早期男性選譯的詮釋框架，轉而代之以「戰前日語世代的女性作家身分」和「跨語際文藝資產的主體詮釋」路徑。這種對話語權的重構，正是其文藝資產得以在 1990 年代末，於台灣文學場域成功實現「正典化」的關鍵技術實踐，它確保了讀者在進入小說文本前，已先置於由作者本人預設的女性視角之中。

這種視角的建立，除仰賴副文本的外部重構，更進一步體現在文本內部的修改。楊千鶴對〈花開時節〉日文版的改動，意義遠非其聲明的「戰前與戰後日語跨渡」所能涵蓋。深入考察，這種重寫行為可視為作者對自身原稿的一種「策略性篡奪」：透過對文本的介入與操弄，不僅解構既有的男性分析框架，更藉由母女合譯實踐，以作者兼譯者的雙重身分，重新宣示文藝作品的本真性。若以女性主義翻譯理論觀之，[72] 此類策略性篡奪實具積極的批判潛能：它不單是跨語境的詮釋行動，更是以女性意識為核心的政治實踐，旨在使隱蔽的女性體驗在改寫的縫隙中浮現。

值得辨析的是，儘管上述改動具備女性意識的特質，但與西方理論強調的語意隱喻或「陰性寫作」有所區隔。[73] 楊千鶴文藝的跨語境傳播，具備鮮明的在地

71　Kwame Anthony Appiah, “Thick Translation.” *Callaloo*, vol. 16, no. 4, 1993, pp. 808-819.

72　Sherry Simon,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Routledge, 1996, pp. 1-26.；劉劍雯，《性別與話語權——女性主義小說的翻譯》（中國香港：中華書局，2016.07），頁 54-63。

73　在法語語系和英語語系中存在著陽性寫作和陰性寫作的論證，但在楊千鶴的案例中，並不適用於西方脈絡下的論述概念。

跨域性——在 1990 年代台灣建構本土主體性的背景下，她藉由批判男性的分析框架與史觀，積極現身於文藝場域，展開話語權爭奪。透過與女兒合作的「介入式重寫」，楊千鶴不僅奪回翻譯詮釋權，更確立在台灣文學史敘述的正統性。此一實踐不單為本土文藝尋回失落的女性聲音，更藉由跨語境的重構策略，將這份文藝遺產轉化為具備性別觀點的歷史見證。

五、結論

本文對 1990 年代楊千鶴日語文藝的翻譯實踐進行脈絡化考察，旨在填補台灣翻譯史研究中，關於日治時期女性文藝長期被漠視、甚至處於缺席狀態的面向。透過探索跨越日治、國府遷台至民主化轉型期的楊千鶴個案，筆者試圖在橫向與縱向的時空座標上，勾勒出日治女性文學於跨語境傳播中，所歷經的政經變遷、語際轉換，以及再詮釋間，不斷角力的複雜過程。

承接上述，筆者進一步提出有別於島內男性作家，透過縱向翻譯，承繼日治文藝資產的既有視角，轉而聚焦女性作者與譯者，在文本再生產中所開闢的性別路徑。透過本研究揭示，楊千鶴的跨語境翻譯，實則交織著台灣政體更迭、國際形勢變遷，以及海外台灣人社群與楊千鶴本人的互動激盪。在回歸現實並朝向台灣民族主義建構的歷史進程中，楊千鶴與島內外文藝場域的連結探究，不僅填補了過往楊千鶴翻譯研究中，對其人政經處境與場域變遷的漠視，更精確定位了此一翻譯行動在歷史脈動中的所在位置。

在此政經脈絡的支撐下，筆者具體深入文本分析，相較前行研究僅止於中譯版本的比較，本文透過重讀戰前與戰後〈花開時節〉日文文本的差異，揭露楊千鶴在 1990 年代重返文壇時，如何策略性地重寫日文原稿。此種加筆增補不僅深化了女性意識，更直接導引其女智美的譯筆，使這場母女合力的譯介實踐，得以從過往男性主導的詮釋框架中解放，奪回跨語境傳播的話語權，進而確立其版本在文學史中的本真性與正典地位。

這種作者晚年對底本的介入，儘管更動幅度不大，卻在 1980 至 90 年代以來日益多元的台灣文學譯介圖景中，增添了關於女性身分特質與制度焦慮的細節。當陳怡君、呂明純等研究者以南天版文本作為論述依據時，楊千鶴的戰後回歸便

不再只是個人文藝資產的復出，而是透過這些修訂過的敘事細節，使日治文學的詮釋路徑在既有的民族與階級敘事外，展現出女性主體自覺的觀察角度。這樣的修訂版本，進一步為重構本土文學正典的動態過程，提供了更為細緻的參照座標。

除了文本重構外，編纂形式亦是關鍵。相較於早期男性編纂版在副文本上的稀缺，母女合作的版本採中日文並置編排，並納入演講稿、書信與讀者回饋等豐富的副文本，成功建構了以女性主體為核心的閱讀框架。

總結而言，本研究試圖透過「介入性重寫」、「翻譯操弄」與「厚實翻譯」的視角，梳理楊千鶴日語文藝在 1990 年代的跨語境傳播，並以此呈現一場具備能動性的女性主體翻譯實踐。這種實踐展現了迥異於西方理論的在地特質：相較於西方女性主義翻譯研究（如 Simon 等人）多植根於其特定文化脈絡對語義隱喻的解構，楊千鶴的行動則回應了台灣特殊的後殖民與跨語境斷層。其行動不僅是語言轉化，更是修復歷史記憶的斷裂。此一修復工程的生命力，亦體現在 2023 年林智美與 Katherine Chen Jenkins 合譯的最新英譯本中，該版本對「三月初」與「尚未結婚」等修訂細節的沿用，標誌著此種主體詮釋已跨越世代和語境。

正是在這種從威權轉向民主、從中國史觀轉向本土主體性的進程中，楊千鶴對原文的重塑，配合相關書信與論述的整合編排，形構了一場「補償性敘事」。這種敘事不單是符號的轉譯，更是透過歷史感與性別意識的交織，在重構本土文學正典的動態過程中，開闢了多音交響的詮釋路徑。這使得楊千鶴的文藝資產在面對後續不同時期的文學史編纂模式時，能提供更豐富的參照點；縱使論述框架不斷更迭，那些幽微的女性生命經驗，依然以不可輕易抹去的痕跡，銘刻於歷史之中。

參考資料

一、專書

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著，《日台関係史 1945-2008》（日本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03）。

王惠珍，《譯者再現：台灣作家在東亞跨語越境的翻譯實踐》（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20.10）。

台灣文學研究會主編，《先人之血 • 土地之花》（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08）。

何義麟、許維德、藍適齊主編，《思鄉懷國：海外臺灣人運動文獻選輯》（台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22.12）。

林衡哲，《林衡哲 80 回憶集》（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2020.02）。

——，《開創台灣文化的新時代》（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11）。

邱貴芬主編，《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上（台北：女書文化，2001.07）。

施淑編，《日據時代臺灣小說選》（台北：前衛出版社，1992.12）。

洪淑芩，《聚焦臺灣：作家、媒介與文學史的連結》（台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06）。

張良澤，《四十五自述：我的文學歷程》（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02）。

張俐璇，《建構與流變：「寫實主義」與臺灣小說生產》（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6.02）。

張誦聖，《臺灣文學生態：戒嚴法到市場律》（台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2.12）。

陳翠蓮，《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美國、國民黨政府與臺灣社會的三方角力》（台北：春山出版，2023.11）。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麥田出版社，2017.08）。

楊千鶴，《人生のプリズム》（日本東京：そうぶん社，1993.07）。

——— 著，張良澤、林智美譯，《人生的三稜鏡》（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03）。

——，《楊千鶴作品集 3　花開時節》（台北：南天書局，2001.01）。

劉劍雯，《性別與話語權 —— 女性主義小說的翻譯》（中國香港：中華書局，2016.07）。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8.06）。

——，《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12）。
賴慈芸主編，《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09）。
鍾肇政、葉石濤主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 8　閹雞》（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79.07）。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2006.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Routledge, 1992.
Simon, Sherry.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Routledge, 1996.

二、論文

（一）期刊

〈衷心的感謝〉，《文學台灣》13 期（1995.01），頁 334。
〈衷心的感謝〉，《文學台灣》14 期（1995.04），頁 334。
〈衷心的感謝〉，《文學台灣》15 期（1995.07），頁 338。
吳濁流，〈新文學運動的雰圍氣〉，《臺北文物》「北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專號」3 卷 2 期（1954.08），頁 48-49。
呂明純，〈大東亞體制下的女性文明想像〉，《臺灣文學學報》16 期（2010.06），頁 193-219。
張俐璇，〈北美臺灣文學研究發展：以「台灣文學研究會」與《台灣文學英譯叢刊》為例〉，《台灣文學研究彙刊》23 期（2020.02），頁 73-119。
——，〈冷戰年代的翻譯介入——「新潮文庫」的譯者觀察（1967-1980）〉，《文史台灣學報》3 期（2011.12），頁 53-98。
黃得時，〈臺灣新文學運動概觀 (上)——一、導言（「新青年」時代）・ 二、新文學運動的先聲（「臺灣雜誌」時代）・ 三、新文學運動的發軔（「臺灣民報」時代）〉，《臺北文物》「北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專號」3 卷 2 期（1954.08），頁 13-25。
楊千鶴，〈花咲く季節〉，《台湾文学》2 卷 3 期（1942.07），頁 144-160。
——，〈殷切期待更慎重的研究態度〉，《文學台灣》16 期（1995.10），頁 331-334。

——— 著，林智美譯，〈給葉石濤先生的一封公開信〉，《文學台灣》22 期（1997.04），頁 302-314。

葉石濤，〈《台灣文學集》序〉，《文學台灣》18 期（1996.04），頁 16-17。

廖漢臣，〈新舊文學之爭 (上)——臺灣文壇一筆流水賬〉，《臺北文物》「北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專號」3 卷 2 期（1954.08），頁 26-37。

趙綺娜，〈美國政府在台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一九五一至一九七〇）〉，《歐美研究》31 卷 1 期（2001.03），頁 79-127。

鄧敏君，〈《亞細亞的孤兒》：翻譯、重譯與翻譯文本外部的聲音〉，《翻譯學研究集刊》22 輯（2018.12），頁 83-100。

Appiah, Kwame Anthony. “Thick Translation.” *Callaloo*, vol. 16, no. 4, 1993, pp. 808-819.

Cantrill, Aoife. “Mother of the Nation: A Short Translation History of Yang Qianhe’s ‘Flower Blooming Seas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vol. 6, no. 1, 2023, pp. 82-108.

Chamberlain, Lori. “Gender and the Metaphorics of Translation.” *Signs*, vol. 13, no. 3, 1988, pp. 454-472.

（二）學位論文

王梅香，〈隱蔽權力：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文學（1950-1962）〉（新竹：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5）。

李亞橋，〈「內戰—冷戰」結構下《文星》雜誌的自由主義文化運動〉（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24）。

陳怡君，〈日治時期女性自我主體的實踐——論楊千鶴及其作品〉（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三、報紙文章

葉石濤，〈《台灣文學集》序〉，《太平洋時報》，1996.11，6 版。

四、電子媒體

陳惠亭，〈太平洋時報的初期奮鬥史 (1989)〉（來源：https://taiwaneseamericanhistory.org/blog/my-stories-693/，檢索日期：2025.09.14）。

劉格正，〈美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 簡史 [二十年是如何走過來的]〉（來源：https://taiwaneseamericanhistory.org/blog/ourjourneys245/，檢索日期：2025.09.15）。